

CHINA'S NORTHWEST RELIGIOUS LITERATURE

中国西北宗教文献

基督教与景教卷二



读者出版集团
甘肃民族出版社

目 录

元代著名维吾尔族外交家、旅行家——拉班·扫马	王永生(1)
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	林悟殊 荣新江(5)
明末清初陕西的传教士	贾二强(21)
西安基督教青年会简史	田景福 李因信(27)
元代景教徒扫马和马可	周祯祥(35)
基督教在甘早期传播史事发隐	陈静(42)
从景教碑所镌僧寺看中西交通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布	周祯祥(47)
近代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西北少数民族中的传教活动及有关文献概述	房建昌(58)
西域景教文明	周葆菁(69)
西域景教考述	高永久(79)
唐代景教与大秦寺遗址	李伯毅(86)
关于“景教碑”出土问题的争议	周祯祥(90)
最早的汉译基督教文献与翻译中的误解误释	刘阳(99)
蒙元时期基督教在华兴盛的原因	徐飞(105)
《景教创世颂》(拟题)非宋人诗	王宗祥(108)
敦煌遗书《大秦景教宣元本经》考释	林悟殊(110)
景教传播的几个特征	周燮藩(118)
景教的产生及其在西域的传播	高永久(125)
论汉语景教经文的传述类型	翁绍军(136)
唐代景教四则	黄夏年 梁晓俭(145)
浅识景教碑几个叙利亚文字考释之歧异	周祯祥(151)
中国唐代景教的再认识	黄夏年(162)
基督教在甘肃的传播和影响	王步贵(176)
所谓唐代景教文献两种辨伪补说	陈怀宇(182)
《西北边荒布道记》及其史料价值	刘瑛(195)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新考	晓楚(198)
近代新疆基督教史的研究及史料	房建昌(201)
外国学者对于西安府大秦景教碑的研究	耿昇(206)
延安时期的天主教和基督教	文刀(215)
高昌回鹘景教研究	陈怀宇(217)
叙利亚文和回鹘文景教碑铭文献在中国的遗存	牛汝极(267)
基督教与元朝的社会生活	申友良 周玉茹(276)

关中大秦寺塔 关英(282)

盩厔大秦寺为唐代景寺质疑 林悟殊(284)

敦煌新出土叙利亚文书释读报告(续篇) 段晴(296)

话说景教 关英(303)

富冈谦藏氏藏景教《一神论》真伪存疑 林悟殊(304)

试论基督教在我国传播的方法 卓永强 柳之茂(324)

景教在中古中国的命运 陈怀宇(328)

唐代首所景教寺院考略 林悟殊(341)

元代著名维吾尔族外交家、旅行家

——拉班·扫马

王永生

元朝是我国维吾尔族人才辈出的时代，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拉班·扫马(Rabban Sawma)就是其中之一。(拉班“Rabban”为叙利亚语，又译作“列班”，是“大师”、“长老”的意思，下文简称扫马)

扫马(1225—1294年)出生于一个随同蒙古人一起入居大都(今北京)的畏兀儿(维吾尔)景教徒家庭。景教是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在中国的名称，自公元635年传入中国后，经过唐末和五代的战乱在中原已临绝迹，但在契丹、蒙古、维吾尔等游牧民族中，却一直有人信奉不衰。扫马的父亲就曾在北京景教教会中任职。由于受家庭的影响，扫马自幼教授以经文，有志于从事传教事业，23岁接受洗礼，正式成为景教徒。后又招收马可思(Markos)为徒，师徒两人在传经布道之余，希望将来能去耶路撒冷朝圣。这一愿望直到扫马50岁时在获得忽必烈同意后才遇到机会。

纵观龚开一生艺术成就有三大特色：一则在多才多艺之中以画马最为突出；二则以画反映时代，嘻笑怒骂、针砭时弊，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作品如匕首投枪。他不仅鹤立于大批以绘画为清玩的画家之上，而且超过了迂回曲折反映社会的画家；三、为了适应表达内容的需要，他在艺术技巧上大胆采用了与众不同的表现方法，首创了写意画马、墨钟馗等画法，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革新精神，为中国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是一个直面人生的画家，他的作品蕴藏着深刻的内涵和力量，流动着一股奔腾的激情。作为一个13世纪的画家，观察社会达到如此之深度，有如此之远见、胆识、气魄，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扫马师徒两人1275年自京启程西行，首先来到科尚城（今山西东胜），受到镇守此城的两位蒙古王公君不花和爱不花（分别是贵由汗和忽必烈的女婿）的热情接待，并给他们提供了越过沙漠所必需的马匹、毛毯、衣服和大量给养。然后他们经过唐古忒城（今宁夏银川）、沙州（今敦煌），到达一处叙利亚语称为“洛顿”的地方（即今和田）。由于商路被阻，他们在这个“盛产棉花、地毯和玉石的地方停留了六个月”，经过充分的休整后，又继续前进，途经喀什噶尔等地来到怛罗斯城（Talās，今中亚江布尔城）晋謁了设牙帐于此的海都国王。然后取道阿塞拜疆向拔达（今巴格达）前进。途中于马腊格城（今伊朗大不里士）遇到了景教教长（又译作宗主教或大总管，为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最高领袖，常驻巴格达城）马屯哈（Mar Denha），因扫马通晓蒙古和畏兀儿文字并来自忽必烈大汗身边，遂被马屯哈派为特使出使伊利汗国，去为景教争取到东方传教的特权。这一任务扫马很顺利地完成了，于是他们请求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但因沿途不宁而未能如愿。就暂留住任在伊利汗国。这时，马屯哈教长决定利用他们的才能和诚心为教会服务。遂任命较年轻一些的马可思为“契丹城市和汪古部”（即中国北部）的大主教，赐名雅巴拉哈（Jabalaha），扫马为教会的总视察，并被派回中国传教。但没走多远，即因途中发生战争，同时获悉马屯哈教长死于巴格达，于是折回送葬。随后在选举新的教主时，各地主教一致推选马可思为“东方教会大总管”，称为“雅巴拉哈三世”（Jabalaha III），扫马则被选为巡视总监，不久扫马又作为伊利汗国及教会使节被派遣出使欧洲。客居伊利汗国的两位西行朝圣未能如愿的畏兀儿景教徒突然间身价倍增，被委以重任并遣派出使欧洲，不是偶然的，有深厚的政治、宗教原因，是当时中亚政治格局发展变化的结果（详见拙作《试论拉班·扫马出使欧洲及其影响》，载《新疆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1284年，阿鲁浑（1284—1291年在位）即伊利汗国汗位，为了与欧洲基督教诸国建立关系，共同对付埃及的马木鲁克苏丹，急需派人出使欧洲，而在当时伊利汗国来自忽必烈大汗身边，和蒙

古贵族有特殊关系，同时又精通基督教理的扫马自然成了最理想的人选。

扫马带领使团于1287年3月从拔达(今巴格达)出发，沿古代商路西北行至黑海，然后改乘船到达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受到安德罗尼古斯二世(Ant-ronicus II)的热情款待。随后又乘船航行两个月来到意大利那布勒斯港。当他们从那布勒斯陆行赶到罗马时，教皇鄂鲁诺四世(Honorus IV)已去世，新教皇尚未选出，未获得答复。扫马一行遂继续西行，途经热那亚于9月间来到法国都城巴黎，向号称“美男子”的法王腓力甫四世(Philip IV)呈交了阿鲁浑的信件及礼物。腓力甫国王给予了礼遇，并表示愿遣使携带他的亲笔信去见阿鲁浑，还请他们访问了巴黎大学及一些名胜古迹。在巴黎停留一个多月后，扫马一行又向西南来到了加斯科尼(Gascony当时是英国金雀花王朝的领地)拜见了著名的绰号为“长脚杆”的英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I)，英王非常高兴，厚赠了扫马使团，然后扫马等于12月间回到热那亚过冬，同时等候罗马方面的消息。第二年春天，罗马教廷选出新教皇称尼古拉斯四世(Nicholas IV)，他很快接待了扫马一行，对阿鲁浑汗优待基督教和准备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圣地，扩大基督教领土的举动表示感谢。

当时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封建主在一百多年来数次“十字军东征”一再遭到失败之后，仍然没有放弃其占领阿拉伯人领土和耶路撒冷的计划，但显然力不从心。恰好这时盛传西进受挫的伊利汗国甚至元朝统治者都尊信基督教，欧洲封建主喜出望外，改变了早先对蒙古人的看法，企图和蒙古统治者结成联盟去共同对付“异教徒”，甚至还梦想使蒙古统治者改宗天主教，将其势力扩展到东方各国。因此，扫马此次出使欧洲受到普遍的欢迎，很顺利地完成了使命。

1288年4月，扫马一行在详细观看了复活节庆典盛况后带着一大批信件及礼物在法王腓力甫公使团的陪同下离开罗马经热那亚原路返回。

回到伊利汗国后，阿鲁浑对扫马顺利完成出使任务很高兴，给予了嘉奖，使他在聂斯脱利派教会中居于仅次于大总管的地位。

1294年扫马在巴格达去世，马可思亦于1317年死于大不里士，都未再回到元朝，因此汉文史籍中未见到关于他们的记载，但阿拉伯时代的人曾用波斯文给他们写有传记，原著虽已遗失但仍保留有叙利亚文译本即《大总管马·雅巴拉哈和拉班·扫马传》(Histoire de Marjabalaha, Patriarche, et de Rabban Canma)，1888年首次在巴黎出版，1893年法译本问世，1928年和1932年又分别被译成了英文和日文。但直到1976年，才有香港学者罗香林参照英文本和日文本译为汉文，题为《元代景教大德西行伟绩记》(见罗著《唐元二代之景教》一书)。因语言的隔阂，长期以来未能引起国内学术界注意。否则，拉班·扫马和马可思当如玄奘、鉴真一样，先后辉映于中西交通史和世界宗教史的史册，而不仅是两位佛教僧侣专美于前了。但尽管如此，拉班·扫马出使欧洲和马可思出任巴格达聂斯脱利派教长一事仍然是我国维吾尔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中西交通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罗马教皇和欧洲各国多次派遣传教士、使者来中国传教、通好，就是其直接结果。因此，称之为元代著名维吾尔族外交家、旅行家是当之无愧的。

(原载《文史知识》1992年第3期)

所謂李氏舊藏敦煌景教文獻二種辨偽

林悟殊 榮新江

引言

本世紀四十年代，日人小島靖氏得到的《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讚》和《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兩件寫本，以「小島文書」著稱，一直被認為是李盛鐸氏舊藏的敦煌出土唐代景教經典。前者完整無缺，計十八行，其中題記佔三行，文曰：

沙州大秦寺法徒索元

定傳寫教讀

開元八年五月二日。

後者則係殘卷，首殘尾全，存三十行，其中題記佔二行，文曰：

開元五年十月廿六日法徒張駒

傳寫於沙州大秦寺。①

自兩件寫本刊佈後，學界為之矚目，舉凡介紹敦煌景教文獻、論述唐代基督教史之論著，多將這兩件寫本視為珍貴的原始資料，用以「修正補充」史書、碑石之記載，不提及者鮮見②。其間雖也有個別名家，對此兩件寫本疑惑

①佐伯好郎《清朝基督教の研究》，東京春秋社，1949年，1—24頁。

②參看梁子涵《唐代景教之文獻》，《大陸雜誌》第14卷第12期，1957年，395—396頁；龔天民《唐朝基督教之研究》，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60年，41—45頁；劉偉民《唐代景教之傳入及其思想之研究》，《聯合書院學報》第1期，1962年，52—54、57—59頁；梁子涵《唐代景教譯經考》，《大陸雜誌》第27卷第7期，1963年，215頁；孫巧蘭《唐代景教傳流考》，《新時代》第5卷第3期，1965年，34頁；羅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國學社，1966年，33—34頁；R. Mehlhose, 「Nestorianische Texte aus China」, ZDMG, Suppl. I, Teil 2, 1969, p. 444；張奉箴《福音流傳中國史略》卷一，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70年，150—155頁。鄭學稼《中國化的大秦景教》

重重，但也不得其解；緣因深信寫本出自李氏舊藏，必為敦煌真品無疑。^③

小島氏所得的兩件寫本，是否果為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唐代景教文獻？對此問題，筆者擬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做一番較為系統全面的考察，庶幾有助於結此歷時半個世紀之懸案。梁啟超先生有云：「史料以求真為尚」，^④隨著敦煌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對於來歷不清的「敦煌文書」的鑒定工作，勢必漸漸提到議事日程，日益為研究者所重視。筆者僅就「小島文書」做一嘗試，以期拋磚引玉，求得學界師長、同仁的批評指正。

一 「小島文書」的來歷

小島氏所得兩件寫本的最早刊佈者，是日本專治景教的著名學者佐伯好郎博士。他把該二寫本作為最新發現的景教經典，專文加以解說，並附照片，附錄於一九四九年出版的《支那基督教之研究》第四卷，即《清朝基督教之研究》。佐伯氏稱這兩篇經典是「距今六年前，即一九四三年二月及十一月，畏友小島靖君從故李盛鐸氏之遺愛品中發現，由李氏的遺產繼承人相讓得到的」，並且說「同年末」，小島氏把這兩篇經典的照片「寄贈」給他。為了表示對小島氏的敬意，佐伯好郎把這兩篇經典命名為「小島文書」，以A、B相區別。又云「小島文書B」，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已幸運地帶到日本，而「小島文書A」，即《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讚》的原件，却於一九四五年九月從天津撤退混亂之際，與小島氏其他貴重物品一起被盜，業已去向不明。^⑤

有關「小島文書」的來歷，迄今為止，我們所知僅此而已。此後發表的大量論及這兩件寫本的著作，對於寫本的來歷的介紹，均本於佐伯氏的上述說法，沒有任何修正和點滴補充。而佐伯氏之說，當然是依據小島氏所言。由是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有關「小島文書」的來歷，迄今中外學界僅僅聽到小島靖的一面之辭！

由於僅有此一面之辭，其間的細節又一無披露。執此與李盛鐸生平事跡及其藏書流散情形相較，對小島氏所言的可信性，不由得產生許多疑問。

按李盛鐸字椒微，號木齋，江西德化（今九江）人，為清末到民國時期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5卷第10—11期，1972年），對唐代景教經亦有介紹，唯對小島氏所得二寫本却隻字未提。

③見羽田亨《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讚及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殘卷について》，《東方學》第1輯，1951年，1—11頁。該文已收入《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卷，京都，1958年，292—307頁。

④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77頁。

⑤同注①。

天津的大藏書家^⑥。因家中世代藏書，自己又辛勤收購，擁有大量珍本秘籍；更曾利用職權，攫取一批敦煌藏經洞出土寫本精品，加之受贈的散件，李氏又是中國首屈一指的敦煌文書收藏家。不過，根據有關的傳記，李氏「晚年境遇窘迫，其妾張淑貞又以木齋遺棄傷害罪訴之於天津法院，索賠五萬金。李氏不得不同北平圖書館相商，要出賣他的藏書，因當時北平圖書館經費緊張而未成交。於是他就把幾種宋版書抵押於北平一家書店，借以償還債務。」^⑦一九三五年，李氏更將家藏的一批敦煌寫本精品，「以八萬日金，售諸異國」，目錄載於是年十二月十五日及廿一日的《中央時事週報》，計有三百六十件之多。其中第十三件寫本便是本文將一再提及的景教文獻《志玄安樂經》。一九三六年，李氏又繼續求售，是年的《學觚》第一卷第七期便刊出《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寫本目錄》，編者並加按語云：「近聞李氏又有一批求售，雖數量較上次為少，且精美亦遜，但亦有重要者。特覓得其目，附載於此，以為國人之注意古籍者告。」^⑧

李氏卒於一九三七年二月四日^⑨，當時的教育部為防李氏藏書外流，特

⑥有關李盛鐸的生平，見橋川時雄《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鑑》，北京，1940年，166頁；張玉範《李盛鐸及其藏書》，《文獻》第3輯；收入作者所編《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鄭偉章、李萬健《李盛鐸與木犀軒》，見所著《中國著名藏書家傳略》，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但以蘇精《李盛鐸木犀軒》一文最詳盡，見所著《近代藏書三十家》，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年。

⑦鄭偉章、李萬健上引文220—222頁。

⑧以上兩條見《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散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案：《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1990年）177頁有陳垣致胡適信，原文如下：「適之先生著席：今早九時輔仁有會，十一時基金會之約恐不能到。李氏藏敦煌卷，據來目，除大部分佛經外，可取者不過三二十卷。普通寫經，精者市價不過百元，次者更不值錢，來目索價太昂，購買殊不相宜。鄙意只可抵押，抵押之數，可以到貳萬元，惟應要求者一事，應注意者一事。據弟所知，李氏藏有世界僅存之景教《宣元本經》，此目並未列入，恐尚有其他佳卷。此目之外，應要求加入吾人所已知或已見過之稀有珍本。又來目不注行數及長短尺寸，此中伸縮力甚大，最易發生弊病，應注意本主或關係人不至將各卷割裂。鄙見如此，謹請公酌，原目並繳，順候晨安。弟陳垣敬上。八月六日。」從其中所記內容，可知是商議購買李氏出售第一批敦煌寫本事，年代當在1935年。據知當時中國官方（北圖？）就有收購之議，且所藏景教經典，就在必購之列。

⑨按李盛鐸逝世年份，上引諸書所記不同，此據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六年

派北圖館長袁同禮洽商購買李氏藏書，胡適、徐森玉、趙萬里等精於古籍本和敦煌寫卷的專家，曾親到李宅翻閱善本書^⑩。不久，抗日戰爭爆發，此事被暫時擱置。一九三九年末，由偽臨時政府出款，整批將李氏書全部收

（1937）二月五日第二版第一張所登李盛鐸二月四日去世的訃告以及第六版第二張所發新聞稿〈李盛鐸逝世，享年七十八歲〉。

⑩見《大公報》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第六版第二張所登〈李木齋藏書當局擬全部收買〉：「本市消息：前參議院議長李木齋於二月四日去世。聞李氏生前，藏書甚豐，且多宋元明版五海內孤本，當局擬全部收買云。」又《大公報》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三日第十版第三張所登〈李木齋全部藏書政府正接洽收買，教部出價三十萬元，李氏家屬索六十萬〉：「本市特訊：……今年二月四日，李氏在津市秋山街二百零一號私寓逝世。嗣後，某國方面，迭次擬以重價收買李氏全部藏書。李氏哲嗣多人，以不願使之流傳國外，迄未與對方商洽。最近教育部方面，擬以三十萬元，全部收買。家屬以李氏在世時，有債務二十五萬元以上，善後事宜，諸待料理，提出六十萬元之數。經教部派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與李氏家屬李幼齋、李少齋、李少微等迭在北平接洽，胡適、沈廉士、董康諸人，亦從旁促成，極希望政府能全部接收，故意見已趨接近。李少微於昨晚由平返津，如無波折，袁氏定日內來津，視察藏書。聞全部藏書，最精華部分，為名家稿本、明版而為清代所禁者、抄本、宋版、日本刻本等等，共約五千種。而抄本及稿本，則佔三分之一。全部藏書之半，現在新華銀行抵押保存，秋山街李寓，已裝箱者約四十大箱，未裝箱者亦如之。」下列珍貴書目，無敦煌寫卷。又《大公報》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三十日第六版第二張〈李木齋藏書五千種政府收買條件接近〉：「本市特訊：藏書家李盛鐸於本年二月四日逝世後，其家藏珍籍五千餘種，頗為外人所覬覦，屢次欲出重價收買。李氏家屬以事關我國文化，不肯與之接洽。嗣後教育部擬以三十萬元全部收買，其家屬以李氏在世時，負債達二十五萬元以上，而將來修墓立祠，整理遺著，及結束身後其他事宜，亦在在需款，曾提出六十萬元之數，詳情業誌日前本報。現悉此事接洽，已見端倪。緣自李盛鐸作古，藏書之保存問題，極為國內學術界所關切，故自教育部進行收買以來，各方面皆願促成。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奉教育部命，特於本月十四日邀趙萬里、傅增湘、徐鴻寶諸人，由平來津，與李氏家屬李少微等，接洽此事。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胡適，亦於十五日趕來參加。經李宅將存於新華銀行保管之藏書運回秋山街寓內，按照藏書目錄，請胡適、袁同禮等檢閱，至十七日始畢。胡、袁等發現珍貴文籍甚多，認為確有由國家接管之價值，對其家屬現在之處境，亦極表同情，一再與教部電商結果，教部願增撥十萬，胡適並允負責交涉，再增二萬元，總數為四十二萬元。李氏家屬

購，交北京大學文學院典藏^⑪，今歸北大圖書館。既然李氏晚年已迫於經濟原因，將其珍藏品大量出售，而身後遺屬更迫不及待地求售全部藏書。小島氏所得兩件寫本，若是真品，當最可索價，何以一直死藏不露，直待李氏卒後六年，即一九四三年二月，纔被「發現」。這究竟是純係偶然的機緣，抑或是其中有詐？

二 李氏舊藏的敦煌景教經典

李盛鐸舊藏的敦煌景教經典，並非無案可稽。王國維一九一九年七月初七日致羅振玉書信中，已經提及「李氏諸書，誠為千載秘籍，聞之神往！《甘露二年寫經》，君楚疑為苻秦時物，亦極有理。景教經二種不識但說教理，抑兼有事實，此誠世界寶籍，不能以書籍論矣。」^⑫一九二三年，抗父發表《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在綜述「敦煌千佛洞石室所藏古寫書」時，對李氏藏景教經更有明確的報導：「子部則有《老子化胡經》（英、法俱有之），摩尼教經（京師圖書館藏一卷，法國一卷，英國亦有殘卷，書於佛經之背），景教經（德化李氏藏《志玄安樂經》，《宣元至本經》各一卷，日本富岡氏藏《壹神論》一卷，法國國民圖書館藏《景教三威蒙度讚》一卷，）……」^⑬

則希望政府撥足五十萬元，俾敷料理一切，故尙待繼續商洽。聞胡適允於參加『廬山茗叙』之便，向蔣委員長陳述，代為面懇，預期此事不久可得結果。李氏家屬擬於議定之後，先在津市舉行公開展覽，然後再行起運。」胡適日記亦載此事，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條記：「守和（袁同禮）為李木齋家藏書事邀吃飯，客人為李氏三子：家浦（少齋）、家濫、少微、董授經先生（董康）等。李家原索價八十萬元，政府已許三十萬元，現李家減至五十萬元。今夜我提議以四十萬元為折中之價。至席散時尚無成議。」六月十五日條記：「下課後，上車到天津，袁守和到站接我。晚飯後同到李木齋宅去看他的遺書。李氏兄弟子姪搬出他家善本書，趙斐雲（萬里）紀錄，守和、徐森玉（鴻寶）與我同看。到半夜始散。」六月十六日條記：「早九點又到李宅看書，到十一點，趕快車回家。」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的日記》，香港中華書局，1985年，566、568頁。據以上公私記錄，李盛鐸死後，藏書沒有打散，而是全部收購。而所有記錄中，不見有關敦煌文書的記載，推測因此項價值最高，故李氏終前已售盡，用以抵償債務。

⑪蘇精上引文 27—28 頁。

⑫王國維《觀堂書劄》，《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 1 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年，37 頁。

⑬載東方雜誌社編《考古學零簡》（東方文庫第七十一種），上海商務印書館，

對於李氏所藏的景教經典，學界至為重視。日本羽田亨博士經人介紹、斡旋，於一九二八年十月七日，專程到天津英租界黃家花園，拜訪了李盛鐸。李氏遂將所藏的《志玄安樂經》原件出示給他，羽田氏做了錄文，附考釋於次年刊佈^⑭。該件已於一九三五年春售諸日本某氏，一九五八年出版的《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卷，刊出其首尾兩幀照片。

至於抗父提到的《宣元至本經》，羽田氏稱當時李氏將其放在上海，故未得見，「但據李氏所言，其經不過二、三十行文字耳，尚有長長的空白，已劃好細欄；文末雖有結句，但是否為全卷之終結，則尚不明了。多半是抄至中途便作廢了。」^⑮一九三〇年，李氏曾將該經展示給時任輔仁大學校長的陳垣先生，陳氏抄錄了前十行文字，提供給佐伯好郎研究。一九三四年，佐伯氏便將這十行文字刊佈在《輔仁學誌》，並加英譯；編者的英文按語說明了錄文的來歷^⑯。一九三五年，佐伯氏又將這十行錄文刊於所著《景教之研究》一書中，但把十行經文誤作十一行，並稱第十二行以下已佚，學界信以為然^⑰。一九四三年，佐伯氏在其《支那基督教之研究》第一卷中，轉載十行錄文，並轉述了親睹過原件的陳垣對該寫本的描述，稱該件「與羽田博士見過的《志玄安樂經》同樣是用黃麻紙書寫，上下行間劃有細絲欄；其字體也與《志玄安樂經》同。」^⑱該寫本原件照片也在《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卷刊出，見該書圖版七。從照片看，與當年李氏告訴羽田亨的情況完全一致，計有文字二十六行，前十行與佐伯好郎刊佈的十行一字不差；寫本劃有細欄，末尾結句下空餘二字格，似未抄完；從內容看，全卷亦未結束。與《志玄安樂經》的寫本字體相同，陳垣所述無誤。因此，我們可以斷言：照片上的這件寫本應當就是一九二三年抗父所提及的《宣元至本經》。不過，這件抄本標題少一「至」字，僅作「大秦景教宣元本經」。抗父的報導之所以較原件多出一字，原因是不難解釋的。早在一九〇九年，羅振玉便將伯希和在敦煌藏經洞中得到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和《尊經》刊佈^⑲，而《尊經》中羅列的景

~~~~~  
1923年12月，97—98頁。

⑭羽田亨《景教經典志玄安樂經に就いて》，《東洋學報》第18卷第1號，1929年。該文已收入《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卷。據稱錢稻孫有漢譯文載《清華周刊》，惜未得寓目。

⑮《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272頁。

⑯P.Y. Saeki, "The Ta-Ch'in Luminous Religion Sutra on the Origin of Origins", 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9, 1934, pp.133-135.

⑰佐伯好郎《景教の研究》，東京，1935年，736—742頁。

⑱佐伯好郎《支那基督教の研究》第一卷，東京，1943年。

⑲羅振玉《敦煌石室遺書》，1909年刻印本。影印本見羅振玉《鳴沙石室佚書續

教經典名錄中，就有「宣元至本經」。這一點必為抗父所熟悉，故把「宣元本經」誤作「宣元至本經」。有無「至」字，意思雷同，多一字更易理解，故學者取用後一名稱，亦情理中事。

《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將李氏舊藏的《宣元本經》的照片刊出，純係偶然的誤會。編者顯然是要刊出小島文書 B《宣元至本經》的照片，以配合該書所收入的有關論文，即《〈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讚〉及〈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殘卷考釋》但却誤取了《宣元本經》的照片。我們推測這張以前從未刊佈過的照片，必是來自京都大學的羽田亨博士紀念館。據此推測，《宣元本經》也像《志玄安樂經》那樣，已流入日本，而羽田氏到晚年纔得到照片，但未及研究便病逝了。

以往學者多依佐伯好郎的說法，認為小島文書 B《宣元至本經》，便是佐伯氏先已刊佈的《宣元本經》十行的後半；原寫本二十六行全部刊出後，這種觀點當不攻自破。然而，儘管照片已在一九五八年發表，但祇有榎一雄博士曾注意及此，並否定佐伯氏的說法<sup>②①</sup>。而大多數研究者仍繼續將兩件寫本混同為一，強拼在一起。<sup>②②</sup>

上面所述，已將抗父所報導的李氏藏景教經典兩種調查清楚，說明其與小島文書斷無關聯。至於王國維書信中提到的李氏藏兩種景教經，雖然沒有道出經名，但無疑即抗父所報導者。按王氏稱二種景教經「不識但說教理，抑兼有事實」，正好是《志玄安樂經》和《宣元本經》的特點，兩經都是闡述教理，且有說教、聽講者名稱和說教地點，以及其他一些細節描寫。而小島文書 A《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讚》係讚美詩體，並不說教理；小島文書 B《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雖言教理，却一無事實。更有卷末題記，最引人注目，李氏展示給羽田亨和陳垣的景教經典寫本，均未言及有題記。因而我們可以斷言，王氏所說之李氏所藏景教經典，即羽田亨、陳垣所見者，絕非小島文書。

按敦煌藏經洞出土寫本，雖數以萬計，但其間景教經典與摩尼教經一

編》，1917 年出版。

<sup>②①</sup>K. Enoki, "The Nestorian Christianity in China in Medieval Time according to Recent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Atti del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Sul Tema: L'Oriente Cristiano nella Storia della Civiltà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1964, Nr. 62), Roma 1964.

<sup>②②</sup>例如江文漢《中國古代基督教及開封猶太人》，北京知識出版社，1981 年；郝鎮華譯《1550 年前的中國基督教》附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C. Y. Hsü, "Nestorianism and 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China", Asian Culture Quarterly, XIV-1, 1986, pp.67-68.

樣，極為稀少，故彌足珍貴。李氏作為大藏書家，博學多聞，當深知景教寫本之貴重，若有所藏，必當與同道或高明者切磋探討，其將《志玄安樂經》和《宣元本經》出示給羽田亨、陳垣諸學界巨擘，正是其藏書家本色的表現。而小島文書若為李氏所藏，焉會一無所露，直待身後數年，方由外人來「發現」？於情於理，殊難解釋。

### 三 「李氏題記」剖析

言小島文書為李氏舊藏，雖無案可稽，但論者却有「李氏題記」為證，使人不由不信。

「李氏題記」最早由羽田亨刊佈在其所寫《〈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讚〉及〈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殘卷考釋》一文中。該文附有小島氏提供給他的兩件寫本照片，其中《宣元至本經》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卷首有「李氏題記」三行，羽田氏已照錄無誤：

景教宣元至本經卅行開元年號

此稀珍品乃祿經背者余所發見

至足寶貴也

題記並無署名，但鈐有李氏藏書印之一「麀嘉館印」。<sup>②</sup>

羽田氏於文章中說明，早在一九四五年，天津的小島靖就已將這兩件寫本的照片寄贈給他，但由於未睹原件，故遲遲不敢公開發表。而今因為佐伯氏已將兩件寫本刊出，他纔不得不抱病撰寫此文，提出自己的看法。羽田氏治學之謹嚴，於此可見一斑。小島文書題記的年代，明顯有悖史實，故羽田氏對這兩件寫本實際是持懷疑態度的，但礙於李氏「為斯道公認之權威」，有其題記，則不便直言。

對於「李氏題記」的可信性，我們是持否定態度的，理由如次：

第一，正如榎一雄已經注意到的，佐伯氏一九四九年出版的日文著作《清朝基督教之研究》和一九五一年修訂版英文著作《中國的景教文獻和遺物》<sup>③</sup>，均刊出小島氏提供給他的兩寫本照片，其間不見有「李氏題記」。<sup>④</sup>佐伯氏在書中也隻字未提「李氏題記」，似乎不知有其事。按小島氏寄給佐伯氏照片，時在一九四三年末，比給羽田氏的時間早了兩年。是提供給佐伯氏的照片沒有拍題記，還是佐伯氏認為題記無關要旨而不予刊佈和提及。可能性唯此兩種，而前者的可能性自然比較大，因為佐伯氏不會不知道李氏題記的份量。若屬前者，人們自然要問，小島給佐伯的照片為何沒有「李氏

②同注③

③P. Y. Saeki,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 Tokyo 1951.

④K. Enoki, *op. cit.*, p.68.

題記」，而兩年後給羽田氏的照片却有？我們不能代替小島氏回答問題。不過，我們查閱了佐伯好郎一九五五年出版的《中國景教衰亡史》，該書卷首圖版，特刊出小島文書照片兩幀，頗為清晰，其中《宣元至本經》的照片顯然是重新拍攝的，下注明該件「今寄託同志社」<sup>②⑤</sup>。我們將其與羽田氏發表的照片比較，明顯可以看出：《宣元至本經》寫本背面有裱紙，卷尾裱紙上鈐有「小島」小方印一方；卷首裱紙空白處，正是羽田刊照片上「李氏題記」的位置，却不見有任何字跡。細審羽田刊照片，「李氏題記」並非寫在原件裱紙上，而是另用小紙片書寫，粘於裱紙上，這顯然違反了書寫題記的一般習慣。該寫本至晚從一九五五年便已寄放在京都同志社大學圖書館。一九六三年三月，榎一雄親到該館考察原件，也未見有「李氏題記」<sup>②⑥</sup>。小島氏所得寫本是否確屬敦煌真品，「李氏題記」可說是最權威的鑒定，而今却被揭去，這至少說明寫本的擁有者對其可信性已有所懷疑。

第二，假如李氏生前認為《宣元至本經》「至足寶貴」而特加「題記」的話，那麼《大聖通真歸法讚》不也是「景教經典」，不亦有「開元年號」，雖僅十八行，但却是完完整整的一篇文獻，其「寶貴」的程度比前者有過之而無不及，同一李氏，却何以一字不題，如此厚彼薄此？

第三，「李氏題記」的真跡，羽田、佐伯、榎諸氏都無緣親睹，遑論他人。如今單從照片來定真贋，誠不足為證。但剖析「題記」的行文，却令人難以置信其出自一位清末翰林的大手筆。查李氏的藏書題記，業經北京大學張玉範女史整理發表者，已有一百七十三篇<sup>②⑦</sup>。筆者研讀這些題記，深為李氏文筆之洗練、內容之簡扼所折服。至於李氏書於敦煌寫本上的題記，更是惜墨如金。以其《志玄安樂經》的題記為例，字僅一行：「丙辰秋日，于君歸自肅州，以此見詒，盛鐸記。」<sup>②⑧</sup>我們幾不可增刪其一字。再看《宣元至本經》的「李氏題記」，豈可與此同日而語？第一行「景教宣元至本經卅行開元年號」十三字，便純屬廢話，因寫本明書「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一卷」，而開元年號和行數，讀者甫視寫本，即可了然。至於第二、三行，意思表達得又多疊床架屋。祇要把第二行的「稀珍品」改為「稀世珍品」第三行的「至足寶貴也」，便可全刪。如此贅腳的題記，猶如小學生的作文，焉會出自李盛鐸這位光緒十五年己丑科殿試一甲第二名的進士之手！

②⑤佐伯好郎《中國に於ける景教衰亡の歴史》，京都同志社東方文化講座委員會刊行，1955年。

②⑥同注②⑤。

②⑦李盛鐸著、張玉範整理《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

②⑧《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卷圖版六。

第四，《志玄安樂經》的李氏題記不僅署「盛鐸記」，且鈐以私章「李印盛鐸」<sup>②⑨</sup>，大藏書家謹嚴之學風，躍然紙上。而《宣元至本經》的「李氏題記」，不僅無署名，且不鈐私印，而代之以「摩嘉館印」這種藏書章，實為牛頭不對馬嘴。

此外，「題記」第二行的「此稀珍品乃裱經背者」一句，貌似行話，細思却有杜撰之嫌。以一頁可書寫三十行經文而有綽餘的黃麻紙，用於裱經背，在敦煌文書中，恐極為罕見。筆者有幸接觸英國圖書館收藏的大量敦煌文書原件，所見裱經背者，均係零碎之小紙片，唯裱經帙，方用大塊麻紙。此點苟作獻疑，質之高明。

#### 四 「李氏」藏書印的考察

以往學者不敢懷疑小島文書的真實性，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即寫本上鈐有「李氏」的藏書印。李盛鐸藏有大量敦煌文書，早已為世人所熟知<sup>③①</sup>。因此，凡鈐有李氏印鑑的文書，自令人信為真品。然而，李氏死後，「傳聞李盛鐸的印記都流落在北平舊書店中，店主凡遇舊本，便鈐上他的印記，以增高價」<sup>③②</sup>。另外，藤枝晃教授揭露了這樣一個事實：曾有人偽造李氏的印鑑，以倒賣所謂敦煌文書。他詳細考察了京都國立博物館收藏的守屋孝藏蒐集的「敦煌寫本」，發現鈐在上面的「李氏藏書印」字同而形異者竟有多枚，如「木齋審定」印有三種，「木齋真賞」印有四種，「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印多達八種！<sup>③③</sup>而就我們所知，李氏這些藏書印，每種僅有一枚。所以我們可以判定，在這些寫本上所鈐的「李氏藏書印」，有不少屬於偽刻。

小島文書上的「李氏」印記是否也是偽刻，有待專家鑑定。不過，僅從照片來看，我們發現《大聖通真歸法讚》上所鈐「摩嘉館印」，與《志玄安樂經》上的同一印，字體就不無差異：前者筆劃較為粗圓；後者則細方，稜角分明。但既然原件已佚，也就無從做真正的鑑定了。因此，我們祇好另覓新蹊，從李盛鐸生前用印的習慣來考察小島文書上的印記。

按李盛鐸室名別號很多，有凡將閣、建初堂、甘露籙、廬山李氏山房、摩嘉館、古欣閣、麗青閣、兩晉六朝隋唐五代妙墨之軒、蜚英館、延昌書

②⑨同上。

③①關於李盛鐸佔有敦煌文書事，參看羅振玉《姚秦寫本維摩詰經殘卷校記序》、饒宗頤《京都藤井氏有鄰館藏敦煌殘卷紀略》，《選堂集林·史林》，香港中華書局，1982年，998—1007頁。

③②蘇精上引文28頁注引譚如莘編《書林掌故續編》「古書作偽種種」條。

③③藤枝晃《「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印について》，《京都國立博物館學叢》第7號，1986年。